

“淞沪抗战史料丛书”的价值和意义

■余子道

“淞沪抗战史料丛书”选编的出版项目,是“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课题组正式立项的18个项目中的一个重要选题。这是一套大型多卷本的当时出版的关于两次淞沪抗战的学术论著和史料图书的汇编。丛书坚持以民族精神为核心,以爱国主义为政治导向,以一·二八、八·一三抗战为主题,以1932年至1949年为出版时限,从国内和海外广泛发掘,选辑和汇编有价值的学术论著和史料书籍予以出版。此项工作从2014年底启动,至今已进行了近四年时间,先后推出四批图书:2015年4月出版第一批,收录32册图书;2017年3月推出第二批,收录26册图书;2017年9月推出第三批,收录29册图书;2018年8月出版第四批,收录33册图书。迄今为止,以上四批已汇集出版的共有120册图书。按照既定计划,明年上半年将推出第五批也是最后一批约30多册图书。总体来说,“淞沪抗战史料丛书”最终将汇集150多册有关史书,成为一套迄今为止在国内外规模最大、收录范围最广、图书品种最为完备的关于淞沪抗战的学术论著和史料图书集成。

“淞沪抗战史料丛书”就其内容来说,以一·二八和八·一三这

两大历史事件为中心,涵盖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蕴含的内容比较丰富,历史信息量较大,史书的性质和门类呈现多样性的特征。大致说来,丛书包含以下八类作品。第一类是军事机关的作战日记、战役战斗纪要和作战总结报告。如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三位将军合著的《淞沪战斗详报》,华振中、朱伯康合编的《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料》,张治中第五军司令部编著的《淞沪抗日战役第五军战斗要报》,宋希濂第三十六师师部《八·一三淞沪抗战战斗详报》,第五军军部参谋处长张觉吾撰写的《淞沪抗日战役所得之经验与教训》等等。二是史学工作者撰写的关于两次淞沪抗战的学术性著作。如憾庐撰写的《上海抗战全史》,何天言的《上海抗日血战史》,徐怡、刘异的《淞沪御日战史》,王叔达的《八·一三上海抗战史》,吴相湘的《八·一三全面抗战》等等。第三类是文化界、新闻界的作家、记者、艺人撰写的关于淞沪抗战的纪实作品、报告文学、战地采访。如郭沫若、田汉的《上海抗战记》,范长江的《淞沪火线上》,杨纪的《沪战实录》,曹聚仁的《大江南线》,谢冰莹的《军中随笔》,田汉的《八百孤军》,胡风主编的《闸北七十三天》,钱杏邨、夏衍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梅



“淞沪抗战史料丛书”
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

益、朱作同主编的《上海一日》等等。第四类是关于一·二八、八·一三两大历史事件的大事日志、史事长编等基础性史料著作。如王功流的《一·二八血战日记》,韦思予的《沪战纪实》,林纪衡的《抗日战事真实报告》等。第五类是上海工商实业界和上海地方头面人物参与淞沪抗战的纪实文书。例如《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报告书》。第六类是亲历淞沪战事的人物、团体和部队的回忆录、回顾录、报告书。如十九路军七十八师一二六旅旅长翁照垣的《淞沪血战回忆录》,十九路军学生随营训练营的《上海各大学学生义勇军抗日报告书》,税警总团第二团《淞沪抗日回顾录》,凌青的《八·一三》《战地服务回忆录》,钱君匋的《战

地行脚》等等。第七类是关于淞沪抗战的纪念性作品和文书,如《淞沪抗战阵亡战士追悼大会会刊》,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二八的一些纪念品》,黄强的《一·二八抗日纪念册》,八十八师《抗日阵亡烈士传记》等。第八类是记录和揭露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的战争暴行和上海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的史料作品。如华之国主编的《闸北的血史》《商务印书馆通讯国难特刊》《沪难与日本》《一·二八两路(京沪、沪杭)创痕》《上海战区接管实录》等等。

这项工作实际上是对这个领域的文化学术遗产加以重新发掘、整理和出版,以推进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借鉴和运用,有利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对丛书的价值和意义,似乎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历史文献意义。丛书收录的产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有关政府机关、军事当局、党派团体、重要人物、重要报刊发表的文告、宣言、总结、记录等等,以及大量有历史价值的学术论著和纪实作品,都是可以传之于后世的,其历史文献意义不可低估。二

是学术史料意义。丛书内容包涵十分丰富的基础性史料,既有宏观层面的宏大叙事,又有微观层面的具体描述。丛书反映的历史过程,涵盖军事、政治、外交、文化、经济和社会生活等等诸多方面,史料丰富多彩。可以说,100多册作品组成的这套丛书,是关于两次淞沪抗战的一个颇具规模的史料库。同时,作为以往的学术研究成果,这许多著作也为当今和今后的上海抗战史的研究,提供了某种可供借鉴的基础。三是社会教化的意义。丛书自始至终贯穿了爱国主义这条红线,彰显了高昂的民族精神和抗战精神,记述了许多英勇悲壮的抗战故事和为国捐躯的抗日英烈事迹,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生动教材。

当然,从历史的视野来观察,这套丛书所收录的所有作品,都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问世的。作品的作者众多,身份各异,立场观点各有不同。他们当中有共产党人、左翼作家、革命的同情者、爱国将领;还有许多是中间派人士、民主自由主义的文化人;也有的是国民党军政当局的官员;少数的还是国民党军政机关的官方出版物。因而,这许多论著和作品反映的是那个时代各界各方面的立场观点、学术见解和认识水平,不可避免地深深地刻上了历史的印记,而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是我们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应有的态度。

幽默的俄语翻译家荣如德

■刘晨

最初读《卡拉马佐夫兄弟》还是大一升大二的暑假,也正是因为这本书,荣如德于我来说成了“神仙”一般的人物。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差不多五年之后,我能有机会见到荣老。

第一次见到荣先生,是2016年的秋天,他是为《荣如德译文集》的事而来的,听说社里新来了一位俄文编辑,又觉天气甚好便过来了。当时刚刚成为上海译文出版社成员的我,还沉浸在获得这份梦寐以求的工作的喜悦中,突然见到偶像,我还狠狠掐了自己一把,确定不是做梦。说实话荣老给我的第一印象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我本以为这样一位大翻译家,翻译的作品又如此深沉晦涩,想来必是一本正经、不苟言笑的;实际上却正好相反,荣老是出了名的和气、幽默。

荣老个子中等,身形清瘦,略有些驼背,头发花白,虽然已经难掩老态,但是气色非常好,与人握手也颇为有力,且不是那种因衰老而无法控制的有力。眉毛虽然也已经变白,但是很长,总之是长寿之相。他很健谈,差不多那天下午整个都用在和荣老聊天上。其实关于《荣如德译文集》的事情并没有聊多少,基本上都在聊他的过去。通过这个下午,荣老对我来说,不再是那个“神仙”一般的人物,却正因为了解了那些平凡的真实,我对他愈加崇敬了。

荣老出生于1934年底,出生时父母均年过四十。同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一样,他的童年少年经历了不少坎坷,但是

他很庆幸,虽然父母均属文盲之列,却坚持让他去上学,也正因为小学时的三位老师在他“这片小小薄田上”也曾撒下几颗种子”,才让他有了后来的成就。1953年3月5日是斯大林逝世的日子,也正是从这天起,荣如德这个名字同翻译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当时才20岁不到的他,开始了俄语教学的生涯。到1956年,他参与了著名俄语教育家、李立三的夫人李莎主持的新中国第一套俄译汉的教材编写工作。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荣老辞去了教学工作转而专职翻译,不久又转到编译所工作。当时因为年纪最小,也未成家,且稿酬收入不菲,他便经常让办公室的同事代领薪水并不必转交,代领者自己安排即可。

到了1990年代,荣老开始动笔翻译《卡拉马佐夫兄弟》。最初对于翻译这部作品,他内心是拒绝的。让他着手开始翻译这部巨著的动机,竟是一位钢琴家的壮举:俄国钢琴家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应邀前往美国作巡回演出。节目是勃拉姆斯的两部钢琴协奏曲:上半场演奏《d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半场休息后再演奏《降B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两部钢琴协奏曲每一部都需时45到50分钟。弹任何一部都足以令演奏者累得大汗淋漓,而里赫特大师一场音乐会把两首协奏曲都拿了下来,中场只有短短一会儿休息时间。这在荣老看来有些超自然的色彩,他起了模仿之意,于是同时接下了两部大部头作品的翻译:《卡拉马佐夫兄弟》和《名利场》。

从荣老谈起这件事的神态可以看出,对于此事,他是非常得意的。顺便提一句,荣老可以说是古典音乐的资深爱好者,每次打电话给他,背景音一定是钢琴曲,而他也把听音乐当作生活中最大的休闲乐趣。

对于这两部作品,荣老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不得不服的苦药;《名利场》则是缓解苦味的巧克力。对于这服苦药,他保持着三天翻译10000字的高效,直到交上了初稿。做过翻译的人想必都清楚,三天10000字是多么可怕的速度。1998年夏天,他开始着手下一部作品的翻译,但遗憾的是,有一天他骑车摔伤了腿,手术后又发生了感染,伤愈后荣老决定不再从事翻译工作了。

随着交往的频繁,我对荣老愈加钦佩和崇敬。他一生未曾结婚,平时的起居多靠自理。但是年纪大了之后,据说房间越来越乱,所以我几次表示要去看望他,他都一口回绝,理由就是:家中太乱,丢不起人,语气理直气壮。有时向荣老求字签书,本想不必麻烦只签名字落款即可,但是荣老不肯,他必定深思熟虑,想好上下款,而且措辞必要符合身份关系又带些幽默。说到幽默,荣老提起曾有人建议由他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他说:“这位仁兄的作品太过一本正经,一点幽默都没有,便是杀了我也不会去翻译的。”而说到自己翻译的作品时,他每次都不忘嘱咐我:“如果发现错误,便大胆去改,千万不要以为我荣某人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去年夏天,有幸



俄国文学翻译家荣如德先生

同荣老一起吃饭,席间他第一次向我说起,他患了阿尔兹海默症,医生已经确诊,所幸尚不严重。我至今仍记得,荣老看着我忧心忡忡的样子,十分真诚地对我说:“我已经够满意了,因为命运对我够宽容的了。”

荣老一直反复强调一位英国老太太——康斯坦斯·加内特对他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帮助极大。这位老太太因喜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半生的岁月都是在俄罗斯度过的,所以才能准确地、恰如其分地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荣老每每在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时遇到难题,俄文之路行不通时,便参考这位老太太的英译本。这话他说得坦荡,毫无遮掩。荣老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加内特这样一位英文译者是他的幸运;而我在想,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荣老这样一位中文译者,应该同样也是他的幸运吧。